

空间视域下的两宋都城话本比较研究

汪建成* · 朴明真**

<目次>

I. 绪论	III. 两宋都城话本的文学象征
II. 两宋都城生活与话本的流通	1. 表征空间与地域意识
1. 空间实践与两个都城的现实面貌	2. 表征空间与语言象征
2. 空间表征与宋话本的流通方式	IV. 结语

I. 绪论

在历史文明的长河中，宋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更是古代城市文明与市民文化结合的高峰期。这一时期以开放式都城制度为标志，¹⁾城市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宋代都市空间结构在继承和发展唐代城市结构的基础上，通过解除坊市制度的时间限制与空间管制，逐步瓦解封闭式城市管理制，形成以街巷为架构的开放式空间格局。《东京梦华录》记载：“御街一直南去，过州桥，两边皆居民。街东车家炭，张家酒店，次则王楼山洞梅花、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御廊西即鹿家包子。余皆羹店、分茶酒店、香药铺居民。”²⁾文中生动描绘了宋代东京(今河南开封)御街的繁华景

* 영남대학교 중국언어문화학과, 박사과정 : 제1저자

** 영남대학교 중국언어문화학과, 교수 : 교신저자

1) 杨宽 著, 《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1页.

2) 孟元老等 著, 周峰 点校, 《东京梦华录》(外四种),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8, 13页.

象，沿街商铺林立，种类繁多，从日常生活所需的炭火、酒店，到特色小吃如梅花、肉饼、包子，再到文化消费如分茶、香药铺，一应俱全。空间上居民区与商铺紧密相连，形成了热闹非凡的商业氛围。这种沿街而设、居民区与商业混合的空间布局，正是宋代城市空间结构逐步瓦解唐代城市封闭式管理，为宋代城市开放式空间格局打下了基础，形成开放式格局的生动写照。与之形成时空对话的是，吴自牧在《梦粱录》中的记述：“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³⁾标志着临安市民阶层的崛起。这种“买卖昼夜不绝”的盛景，实为户盈罗绮的市民经济缩影。两部作品通过汴京与临安的两宋都城对照，生动描绘了宋代城市的繁华图景。

当夜市灯火突破宵禁藩篱，物质交易的时空解放催生出文化消费的结构性质变革。而市民经济的发展，不仅体现为物质丰饶，更催生出新的文化现象。《东京梦华录》里记载：“其余不可胜数。不以风雨寒暑。请棚看人，日日如是。教坊钧容直，每遇旬休按乐，亦许人观看。每遇内宴前一月，教坊内集弟子小二，习队舞，作乐杂剧节次。”⁴⁾的京瓦技艺，成为汴京勾栏瓦舍、夜市文化等市民文化生活样态的生动写照，从中可见杂剧、说书等市井娱乐因市民消费需求而职业化、规模化，已成为常态化的文化现象，折射出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的历史实态。多重历史动因的交织，映现出中国古代城市文明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型，这些因素也共同推动了说书这一根植于市井文艺形式的发展，城市生活构成了说书文艺繁荣演进的核心场域，使说书这一民间技艺活跃和发展在第一线。市民经济的繁荣不仅孕育了职业化的说书艺人和稳定的受众群体，而且通过市场选择机制持续地重塑口头叙事的文本形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由物质空间催生的新型文化现象，在文学维度上具体表现为“说话-话本”的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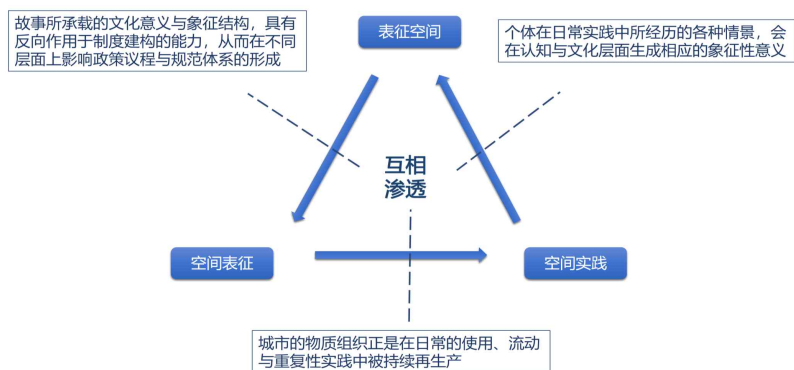
本文依据此将小说类话本作为主要的分析对象，其内容多取材于市民生活、历史故事或民间传说，情节曲折生动，语言通俗活泼。它不仅体现了宋

3) 胡士莹 著，《话本小说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80，39页。

4) 孟元老等 著，周峰 点校，同上书，32页。

人在文化艺术创作上的杰出的才智与技艺，更折射出整个时代文艺的发展水平和认知维度，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与人们的精神世界，映射出普遍的审美追求。在这一过程中，宋话本成为了观察两宋都城生活差异的独特切入点。

两宋都城中流通的话本写作与“空间”问题有密切联系。汴京与临安不仅是文化中心，更是承载市民生活的物理空间、制度管制的权力空间与集体想象的意义空间。话本的创作、流通与发展深度关联此多维度空间结构。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其《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一书中提出的“空间三重辩证法则”，即空间实践(Space practice)、空间表征(Space representation)和表征空间(Representation Space)，为探讨空间生产与文本叙事之间的互动机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⁵⁾



〈图 1〉空间三重辩证法关系图

本研究拟在空间三重辩证法的视角下，以两宋都城的城市生活与传统文学文本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揭示两宋都城的这一空间与宋话本的内在特征之间的关系。主要研究内容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展开：于空间实践层面，分析汴京与临安都城物质生活中勾栏瓦舍、茶坊酒肆等市井空间的布局与市民娱乐

5) 孙婧, 〈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研究〉, 吉林大学 博士论文, 2023, 58页.

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探讨宋代城市空间重组如何通过市民社会活动实现对社会关系的重构；在空间表征层面，研究汴京与临安官方坊市管理制度、印刷出版政策与交通网络规划的差异化表现如何推动宋话本在两宋都城的区别化流通，揭示市场化需求对文化传播空间的塑造作用；从表征空间层面，通过两宋都城话本中语言特色、市井场景描写及空间意象差异，探究市民阶层如何通过语言符号的在地化表达，体现出两宋都城的文化差异性。

II. 两宋都城生活与话本的流通

北宋汴京与南宋临安府，其地理位置和城市环境有着显著的差距，但都由市民阶层主导了城市文化的变迁，为宋话本的兴起提供了社会基础。从汴京到临安，娱乐文化在市民生活实践中不断成长，勾栏瓦舍中的说唱说书，作为口头叙事的文字化结晶，也是文化生产与城市空间互动的产物。从传播上来看汴京奠定了宋话本早期传播的基础，临安则通过技术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完成传播方式的再造。因此本章以列斐伏尔“空间三重辩证法则”中的空间实践⁶⁾与空间表征⁷⁾两个维度，分别考察两宋都城空间的现实面貌与空间构建，探究其空间中的社会活动与文化生产方面的互动关系；揭示出话本流通与传播方式的差异与延续，更进一步全面地理解宋话本产生、发展与再造的城市文化基础。

1. 空间实践与两个都城的现实面貌

在空间实践层面，汴京与临安分别体现出不同的城市运作机制与文化空

6) 空间实践具体表现为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社会交往。(亨利·列斐伏尔 著，刘怀玉等译，孟锴 校，《空间的生产》，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17页.)

7) 空间表征意为一种空间表象可以被另外一种表面上具有相似性而实际上是差异的其他表象所替代，产生了一种空间画面，从而也规定了一种空间。(亨利·列斐伏尔 著，刘怀玉等译，孟锴 校，同上书，17页.)

间逻辑。汴京依托“四水贯都”的水系格局与纵横密布的街巷体系，呈现商业全天候化与功能混合化的特征；勾栏瓦舍的集中布局以及对坊市夜禁的突破，重构了城市时空节律。临安则凭借江南水网与活跃的坊市机制，形成以行市与娱乐业为核心的专业化集聚；文娱活动与水陆交通相辅相成，推动其深度嵌入市井生活与文化消费，展现出南宋城市生活的技术化与商品化特征。

1) 汴京城市生活

北宋的特点为商业活动对空间管制的系统性突破。在坊市界限被打破后，商业活动进一步突破时空限制。同时，建筑功能发生垂直混合，住宅与商铺混杂交错，出现“前店后宅”、“下店上居”的垂直空间利用模式，在宋代都城研究中可见“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⁸⁾、“每日交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诸趋朝入市之人，闻此而起”⁹⁾揭示时间规制的消解与城市经济节律的重构。北宋都城东京经商时间不再受到限制，出现了早市和夜市，马行街灯火照天“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¹⁰⁾，甚至出现通晓不绝的“鬼市”，强化了这种突破的彻底性。州桥一带“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¹¹⁾的专业化区域形成，彰显空间实践对经济贸易的聚集效应。汴京城市繁荣的核心在于商业活动的“空间实践”全面突破了旧制度的时空束缚，塑造了开放、混合、全天候的城市新形态。

汴京繁华景象的背后，离不开以“四水贯都”¹²⁾为骨架的城市布局所提供的支撑。水系成为居民空间实践的载体，沿岸居民依水营生，水系与街巷交

8) 孟元老等著，周峰点校，同上书，22页。

9) 孟元老等著，周峰点校，同上书，24页。

10) 同上。

11) 孟元老等著，周峰点校，同上书，14页。

12) 四水是指汴河、蔡河、金水河、五丈河。

织形成“河街相邻”、“因水而街”的独特商业景观。其中汴河为漕运命脉，沿河设粮仓、码头、客店，形成“河市经济带”。汴河漕运是南北之间物资流通的主流，汴河漕运的粮食数量甚至增加到650石，¹³⁾生动体现出物质流动实践对水系的高度依赖。运河作为水上交通运输的关键通道，其对政权稳定与社会发展具有直接且深远的影响。¹⁴⁾《清明上河图》以首都汴京与汴河为创作背景，其中鳞次栉比的商铺、熙攘的虹桥市场、繁忙的漕运场景，展现出社会繁荣、民俗文化的丰富与经济水平的发达，¹⁵⁾正是北宋东京城人与水互动实践下“八荒争凑，万国咸通”¹⁶⁾盛世景象的最好印证。

正是得益于汴河等水系强大的运输能力，保障了充足的物资供应和便捷的交通，东京才得以容纳急剧增长的人口，并使城区不断扩展，最终成为国际性商贸中心，为催生更加繁荣发展的文化活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北宋的都城汴京在唐五代时已很兴盛，到北宋末年，人口急剧增加，户数多达二十六万，城区渐次扩展，居民的生存空间持续得到开拓。它的繁华情况，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的序言中，也有具体的描绘：“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髻之童，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¹⁷⁾这种富足的景象，催生出汴京发达的消费市场。得益于中原区位优势，盛产小麦，且毗邻黄河，鱼类资源丰富，诞生了满足百姓需求多样化的食铺酒肆。著名的酒楼有七十二座，号称“七十二正店”。¹⁸⁾在这些大型酒店的入口处，设有主廊，长度约为百余步，其布局为“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¹⁹⁾小阁子，亦称酒阁子，类似于现代的小型雅座，该设计正是适应宾客如流需求的实践智慧的产物。其中一些著名的

13) 程民生 著，《宋代地域经济》，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226页。

14) 张义祥，〈北宋大运河功能及社会影响研究〉，郑州大学 博士论文，2021，58页。

15) 张建，〈《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市井——北宋东京研究〉，《河南社会科学》第十七卷，2009，122页。

16) 孟元老等著，周峰 点校，同上书，14页。

17) 孟元老等著，周峰 点校，同上书，3页。

18) 孟元老等著，周峰 点校，同上书，16页。

19) 同上。

酒阁子包括“潘楼”、“会仙酒楼”、“清风楼”、“张八家园正店”、“长庆楼”以及“白矾楼”，亦称“樊楼”。中型店铺虽不具备大型饭店的宏伟壮观，但其以低廉的价格和独具特色的美食吸引顾客，例如曹婆肉饼、薛家羊饭、梅家鹅鸭、曹家从食、徐家瓠羹、郑家油饼、王家乳酪、段家爇物等²⁰⁾。不同种类店铺的差异化经营，在街巷中开辟了各自的生存空间，共同构建起层次分明的消费市场。

在物质生活越加丰富的同时，必然带动娱乐需求的增长。汴京地区的娱乐文化有“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²¹⁾的美誉。北宋汴京的娱乐文化和社会风俗展现出鲜明的市民化与世俗化特征，主要体现在娱乐活动的商业化运作、表演内容的世俗题材、市民作为主要受众和参与者三个方面，深刻反映了商品经济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影响。北宋汴京的娱乐活动以瓦舍勾栏等综合性娱乐场所为核心，其发展的过程生动体现了民间力量对城市空间的改造，艺人搭建勾栏戏棚，商贩沿街设摊，观众聚集观赏的三方互动逐渐形成固定娱乐区。前者(瓦舍)，是综合性娱乐区域的代名词，标志市民阶层崛起。后者(勾栏)为专门演出棚。在这些场所中，发展出了包括杂剧、傀儡戏、说书、相扑等数十类表演，²²⁾均属“伎艺”范畴。²³⁾这些“伎艺”种类繁多，构成了多元化的文化景观，共同推动了汴京文化生活的繁荣，是北宋时期娱乐文化的关键组成部分。

汴京娱乐文化的繁荣，也体现在其庞大的、技艺高超的艺人群体上。嘌唱弟子包括张七七、王京奴、左小四等。杂剧方面，杖头傀儡任小二、悬丝傀儡张金钱、李外宁等人的表演颇具特色。讲史方向，孙十五、孙宽等人的叙述生动、引人入胜。散乐领域，王颜喜、刘名广等人的演出亦颇具影响力。影戏方面，赵七的技艺精湛。此外，说诨话的山人亦为东京娱乐文化增

20) 周芊, 〈东京梦华录之北宋都城汴京民俗生活研究〉, 青海师范大学 硕士论文, 2012, 15页.

21) 邓广铭, 《宋史职官志考正 宋史刑法志考正》,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3页.

22) 梁淑芬, 〈北宋东京勾栏瓦子研究〉, 河南大学 硕士论文, 2009, 33-37页.

23) “伎艺”更被延伸为技艺表演的意思。《东京梦华录》所记载的“伎艺”类别，涵盖了主张、诸宫调、嘌唱、杂手伎等多种表演艺术形式。

色不少，真可谓“其馀不可胜数”。²⁴⁾这些艺人的日常表演实践，将文人叙事转化为市民可参加的娱乐形式，推动了艺术形式的发展。如宋杂剧融合了格物与叙事，内容贴近市井生活，经典剧目《张协状元》以白话演绎婚变故事，批判科举制度下的道德沦丧，成为元杂剧的前身。说书艺术同样引人注目，说书艺人往往以生动的语言和丰富的表情，将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娓娓道来，吸引了大量听众。这种艺术形式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还推动了白话文的传播与应用，使得文学作品更加贴近普通民众，增强了文学的世俗性和普及性，在说书艺术的推动下，宋话本也逐渐发展并繁荣起来，其中充满了世俗社会的生活情趣。

北宋时期，说书艺人的职业分工尚未完全定型，“说书”、“说经”、“说参请”、“说浑话”等表演形式界限模糊²⁵⁾，在同一文化场域中交织共存。这种多元而未分化的表演生态不仅反映了市井文化的开放性，也为话本的生成提供了条件。在说书艺术的推动下，宋话本也逐渐发展并繁荣起来，从口头表演到书面文本的转化，展现了文化生产的空间实践过程。它用写实的手法再现了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中的社会风貌和生活习俗，这也印证了市民文化蓬勃发展的深沉动力“正是宋代城市中新兴的市民文化的发展，广大中下层群众需要参与商品交换、参与生活‘闲暇’，从多种渠道去寻找自身的社会价值这正是—种朦胧的‘历史开拓’。”²⁶⁾北宋时期，经济繁荣昌盛，都市生活繁华多彩，这样社会文化背景下催生了话本艺术的发展，使东京社会娱乐多元，民间文化丰赡。

2) 临安府城市生活

临安府作为南宋都城，不仅是具有江南文化特色的名城，南宋时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还是南宋“百工百业”商业业态的集聚地，城市发展达

24) 孟元老等著，周峰点校，同上书，32页。

25) 程毅中著，《宋元话本》，北京：中华书局，2004，14页。

26) 李春堂著，《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185页。

到了历史顶峰。²⁷⁾临安的城市空间实践在汴京开放性的基础上,受江南水网地貌、北方人口南迁以及浙东事功学派的影响,实现了更深层次的突破,标志着临安城市发展进入更成熟、更市场化的阶段。

“城内有南、中、大、北、浦桥瓦等,城外的便门、候潮、小堰、新开、崇新、东青、钱湖、艮山、余杭门外,西湖的后军寨、行春桥,北郊的羊坊桥、米市桥、石牌头,南郊的龙山市、朱市,城东的王家桥等地,遍设瓦子”²⁸⁾,临安彻底打破了传统“坊市制”、“夜禁制”空间格局,市民生活的空间进一步扩大。《西湖老人繁盛录》载:“御前送朝贵,遍卖街市”。²⁹⁾《梦粱录》载:“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³⁰⁾“昼夜不绝”的商业活动,实质上是市民与商贩日复一日的空间实践。该实践持续冲击实践规制,最终推动城市时空秩序的重构。《都城纪胜》“自大内和宁门外,新路南北,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以至朝天门、清河坊、中瓦前、灞头、官巷口、棚心、众安桥,食物店铺,人烟浩穰。”³¹⁾《梦粱录》载:“大抵杭城是行都之处,万物所聚,诸市百行,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³²⁾皇宫偏居凤凰山南麓,³³⁾商业区位于御街中端两侧,即自朝天门直到众安桥。御街中段演变为商业核心区,并非仅源于官方规划,而是民间旺盛的商业活动自下而上渗透并重塑城市空间格局的结果。这片区域因此汇集了“旷世难寻”的瑰宝以及稠密的人流,生动体现了日常实践对权力空间结构的深刻塑造力。临安的城市空间,本质上是一个由百万居民通过商业、消费、娱乐等日

27) 姜兆捷,《南宋临安城市水系与人居耦合关系研究》,华侨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2023,1页。

28) 斯波义信 著,方健等 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319页。

29) 孟元老等 著,周峰 点校,同上书,104页。

30) 吴自牧,《梦粱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119页。

31) 孟元老等 著,周峰 点校,同上书,79页。

32) 吴自牧,同上书,115页。

33) 杨宽 著,同上书,380页。

常实践持续建构的动态场域，生动体现了临安城市的繁华。

支撑临安空前繁荣的背后，离不开其发达的水运网络所保障的物资供应。临安也通过江南运河连接太湖粮仓，经浙东运河直通明州港，形成“米粮—丝绸—瓷器”的物流网络。这条水运网络不仅是地理通道，更是塑造城市空间时间的关键脉络。运河码头、货栈、转运场成为汲汲营营的高强度运转节点，搬运工、商贾、税吏的活动密度定义了沿河区域的空间特质。这一空间转型的实践形态，集中体现为市场交易、仓储调配与物资转运等经济活动向城市特定区域流动的规模化与专业化集聚，由此重塑城市空间结构。

随着避乱市民的返回以及北方居民的迁徙，临安的人口逐渐恢复增长。绍兴二十六年，起居舍人凌景夏说：“窃见临安府自累经兵火以后，户口所存，裁十二三，而西北人以驻蹕之地，辐辏，众多儒学学者及文人纷纷南迁，追随高宗。其中，包括，伊洛二程的子孙，程颢的长子程端懿落户吴门、程颐次子程端辅迁金城，三子程端彦迁池州。以及以高怀德、朱敦儒、韩肖胄、鹰胄为代表的知名大将、诗人和文学家。³⁴⁾此后，仍有不少北方文人陆续南迁。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文学、艺术才能，通过传承或与南方文化的融合，汲取各方精华，使得宋韵文化在南宋时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和繁荣。在大量的官吏、商贾、士族、工匠南迁后，南方的经济潜力也得到了释放。

强大的物资保障、人口活力与文化动力使临安的娱乐文化得以飞速发展。临安作为江南的典型城市，其城市范围持续扩展，居民数量迅猛增长，商业经济的繁荣程度超越了北宋的东京。经济重心的南迁，不仅转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还对临安的城市生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为宋话本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社会背景和素材。相较于北宋汴京，南宋临安的社会阶层结构展现出更为复杂多元的特征。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市民阶层迅速崛起，成为城市中不可忽视的力量。该阶层包括商人、手工业者、融入市民生活的文人士大夫以及各类服务人员，他们共同构筑了临安这座城市的丰富多彩社会图景。其中以下典型人物尤为突出：临安著名书商、刻书家陈起，其书坊成

34) 任崇岳，〈北宋末年的两次中原大移民〉，《商丘师范学院学报》第二十四卷，2008，41页。

为士人交流思想、构建文化网络的实践空间，推动了知识的传播；被宋孝宗御封而名声大噪的宋五嫂，生动体现了底层群众利用公共空间谋生并创造传奇的实践能力，也映射了皇室权力对市井空间的偶然介入与符号化利用；临安丰乐楼掌柜沈一郎，作为高档酒楼的经营者，其空间不仅提供宴饮服务，更是权贵宴游、富商洽谈、士绅社交的复合场域。这些人物及其活动场所，成为连接物质空间与社会关系的实践节点，推动了城市空间的动态演变。他们的成功既得益于个人才智，更离不开临安宽松的商业环境、消费主义的兴起以及士商合流的社会风气。在此过程中，商业空间不再仅是交易场所，更成为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重要场所。这些鲜活的事例，更印证了南宋时期临安市民经济的蓬勃生机。

在生活风尚方面，临安以“繁华”、“雅俗交融”为典型特征，市民文化空前活跃，南北习俗深度交汇，共同熔铸出独特的都城文化。《梦粱录》记叙临安商市“至三更不绝。冬月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卖”。³⁵⁾该昼夜不息的经济活力以及时人对其“销金窝儿”惯称，可见其奢靡程度非同一般。居民追求生活的时尚与精致，饮食文化尤为突出，繁华酒楼遍布全城，食客如云，生意兴隆，这反映了南宋时期人们前往酒楼消费的习惯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风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坐落在临安丰豫门外的丰乐楼，据《梦粱录》所载：“曰丰豫门，外有酒楼，名丰乐，旧名耸翠楼，据西湖之会，千峰连环，一碧万顷……缙绅士人，乡饮团拜，多集于此。”³⁶⁾这座富丽堂皇的酒楼，正是临安商业高度繁荣的象征。

商业繁荣带来的临安新变，空前释放了市民阶层的文化消费需求，进而显著加速了民间技艺的创新与专业化进程。满足该需求的重要平台为遍布城中的瓦舍。据《梦粱录》记载，杭州城内外瓦舍共有十七处，如“清泠桥西熙春楼下，谓之南瓦子；市市场北三元楼前谓之中瓦子；市西坊内三桥巷名大瓦子，旧呼上瓦子众安桥南羊棚楼前名下瓦子，旧呼北瓦子……米市桥下米市桥

35) 孟元老等著，周峰点校，同上书，232页。

36) 吴自牧，同上书，105页。

瓦子；石碑北麻线巷内曰旧瓦子”，³⁷⁾而《西湖老人繁盛录》，中载，有勾栏十三座，城外瓦子二十座，³⁸⁾瓦舍的繁荣为技艺发展注入了动力，杂技形式日渐繁多，包括踢瓶、弄碗、踢磬、弄花鼓捶、踢墨笔、弄球子、筑球、弄斗、打硬、教虫蚁等门类。³⁹⁾技艺发展的同时，艺人群众中也涌现出诸多杰出代表人物，如专精说话，“一世只在北瓦，占一座勾栏说话，不曾去别瓦作场”的小张四郎；担任教坊大使并创作杂剧的孟角球；谱写四十首大曲词的葛守成；以及凭借卓越音韵才华闻名遐迩的丁汉弼与杨国祥。综上所述，临安瓦舍的遍地开花与技艺的百花齐放，可知临安城市生活之繁华，社会娱乐之丰富，为宋话本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 空间表征与宋话本的流通方式

话本流通网络的形态映射出物质空间结构的特征，可以揭示宋话本流通方式与城市空间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汴京的城市意象通过话本文本被转化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图景。都城内的瓦舍、勾栏等公共空间聚合了戏曲、酒楼、书坊等民间集会与经营场所，成为话本的实际传播节点。临安则借助江南纵横交错的水网和坊市体系，通过雕版印刷与水陆交通构建跨区域的传播网络。叙事中出现西湖、钱塘江、棚北大街书市等城市地标，进一步引申为繁华的“书香”文化坐标。

1) 汴京的话本流通

汴京的“街巷制”突破了传统坊市的界限，形成了开放的城市布局。在该背景下，勾栏瓦舍沿御街呈线性分布，成为市民娱乐活动的中心。这种物质空间的聚集，直观地体现并支撑了“说书人-瓦舍-观众”这一垂直传播体系，其空间形态本身即成为特定社会关系(表演-观看)的表征。话本的流通不仅依

37) 吴自牧，同上书，485页。

38) 孟元老等著，周峰点校，同上书，108-109页。

39) 孟元老等著，周峰点校，同上书，86页。

赖于分散的茶肆与书坊,还依托于官方刻印、私人刻印、坊间刻印以及口头传播等多种渠道,共同构建起“书坊刊刻-茶肆传唱-市民抄传”的网状传播模式⁴⁰⁾生动体现了空间结构(分散与集聚)如何具体地转化为传播路径,即空间对文化形态的塑造作用,这是典型的空间实践与空间表征的互动过程。这种空间变革,本质上是对市民文学娱乐需求的回应。随着城市日益繁荣,市民阶层迅速壮大,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进而极大地推动了文学艺术的繁荣。作为口头叙事表演的“说话”艺术,也在此背景下得到了发展。话本作为说话艺术的底本,是该艺术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⁴¹⁾

话本生成与流通经历了动态的演变过程。起初因社会文化水平和印刷技术限制,说话艺人无固定底本,仅靠口传心授。然而,随着说话艺术的发展,其种类日益丰富,篇幅不断增长,没有“本”就变得难以记忆。⁴²⁾与此同时,伴随着活字印刷技术的完善、书坊规模的扩大以及说话艺人自身文化素养的提升,共同推动了各种话本的出现。早期话本主要供“说话人”自己揣摩复习备忘,或做作为师徒间传习以及子孙世代从业的家传秘本之用。⁴³⁾《醉翁谈录》记载“幼习太平广记,长功历代史书”⁴⁴⁾正反映此阶段艺人的传统训练模式,这也是宋话本流通和保存的重要方式之一。该秘传模式,在空间表征上,体现为一种高度封闭、内部循环的知识空间,其界限由师徒关系严格界定,与后期依托于开放商业空间的流通形成了鲜明对比。

随着勾栏瓦舍的蓬勃发展,讲述者陈旧的叙述已无法满足广大市民群众的需求,《东京梦华录》载汴京瓦舍“不以风雪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⁴⁵⁾讲瓦舍这一特定娱乐空间的熙熙攘攘,成为市民旺盛娱乐消费需求最直接的空间表征。这种根植于特定空间的需求表征,直接催生了专门替讲述者

40) 孟元老等著,周峰点校,同上书,254页。

41) 胡士莹著,同上书,155页。

42) 同上。

43) 胡士莹著,同上书,130页。

44) 罗烨著,《醉翁谈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3页。

45) 孟元老等著,周峰点校,同上书,32页。

编写话本的市场需求，在汴京的著名文人有李造、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等，⁴⁶⁾他们多出身市井，深谙市民审美。这些文人活跃于瓦舍勾栏这一空间表征，扮演着“空间转译者”的角色。他们将最初在民众口头流传（一种弥散的空间实践）、近似真人真事的民间传说和当代新闻，从流动的市井话语空间带入瓦舍这一专业表演空间。“说话”者在演述中各运匠心，添枝加叶，将其改编成情节跌宕、人物鲜活的话本，那些广受欢迎且经久不衰的经典剧目，有人把它抄录下来，成为维持生计的资本，⁴⁷⁾这也是话本流传的方式之一。部分文人对话本进行再创造，进一步推动了话本的传播，如明末作家冯梦龙笔下《警世通言》第十六卷《小夫人金钱赠年少》是对宋话本《志诚张主管》的改编，⁴⁸⁾在保留原作公案精髓的基础上，融入了市民道德观，使得话本内容更具时代深度，吸引了更多读者的关注。此类改编作品将汴京瓦舍空间中的故事记忆与市民生活活力，在新的时代语境下进行重编和再现。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改编作品通过遍布各地的书坊刊刻网络进入更大的流通领域。如钱塘洪楸的“清平山堂”、建宁熊氏的“忠正堂”、长洲冯梦龙的“墨憨斋”、乌程凌濛初的“桂枝馆”、翠娱阁主人陆云龙和陆人龙兄弟的“崢霄馆”、李渔的“芥子园”等书坊，⁴⁹⁾它们将文本从特定表演场所的时空限制中解放出来，转化为可移动、可复制的商品，显著拓展了话本小说的传播广度和影响力范围，使其生命力得以在更广阔的地理和社会空间中延续和扩大。同时，这些改编作品也为后世研究汴京宋话本及其所表征的宋代汴京社会文化空间网络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2) 临安府的话本流通

在南宋临安，活字印刷技术普及、刻书与藏书业发达，使书籍更易获

46) 张兵，〈北宋的“说话”和话本〉，《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1998，87页。

47) 张兵，同上书，87页。

48) 冯梦龙 编，严敦易 校注，《警世通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228页。

49) 王昕 著，《话本小说的历史与叙事》，北京：中华书局，2002，15页。

取；与此同时，钱塘江上大、小船只川流不息、码头货栈林立，反映出临安商贸的繁盛景象。话本的复制与流通在这里不仅满足了经济需求，也成为城市文化审美的再现方式，形成了兼具经济价值与文化品味的新型传播机制。话本的流通形式与内容革新，是宋代市民文学成熟和商业社会蓬勃发展的产物，深刻反映了城市空间结构与社会文化生产之间的互动关系。耐得翁在《都城纪胜》中对南宋都城临安的描述：“自高宗皇帝驻蹕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⁵⁰⁾且《陶庵梦忆·西湖梦寻》有云：“游人至此，买舫入湖者，喧阗如市。东去为玉帛园，湖水一角，僻处城阿，舟楫罕到。寓西湖者，欲避嚣杂，莫于此地为宜。中有楼，倚窗南望，沙际水明，常见浴凫数百，出没波心，此景幽绝。”⁵¹⁾

从中不仅也可看出南宋临安商贾云集、市井喧嚣之盛景，更能体察民生安泰、百业俱兴之治世气象，以及由此催生的新型社会关系与文化需求。这种繁荣的城市空间格局与社会生态，恰似绵绵春雨，悄然滋养了话本艺术生根发芽的沃土，使话本内容题材更加丰富多元，更贴近市井生活和市民趣味。话本的繁荣，本身就是临安特定空间与社会关系相互作用的产物。

南宋临安时期，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改良与官私刻书业的蓬勃发展，话本传播呈现出立体化、商业化特征。雕版印刷技术作为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媒介技术，也被称为宋代最先进的媒介制作技术，号称可以“日传万纸”，⁵²⁾印本具有物美价廉、便携、便藏、讹误少等优势，使其传播无远弗届，受到宋代文人的广为赞誉。其优势在于进一步压缩了文本复制与传播的时空成本，重构了文本流通的时空关系。雕版印刷技术的广泛普及，⁵³⁾使书籍复制摆脱了单一的手工誊录模式，极大提升了宋话本生产与流通的效率和广度。同时，在《西湖老人繁录》中诸行市部分也表明了在临安城的行市中出现了写文字、

50) 孟元老等著，周峰点校，同上书，75页。

51) 张岱著，夏咸淳、程维荣校，《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58页。

52) 于兆军，〈雕版印刷与宋人的图书编刊〉，《出版广角》第十卷，2022，55页。

53) 于兆军，同上文，57页。

纸画儿的市场化行为,⁵⁴⁾进一步印证了临安宋话本的规划化发展。这一技术革新成为促使文集编纂从自发状态向系统化、规范化转变的重要推动力。诗文著作从口耳传播、手抄笔录发展到镂版印刷,须臾之间便可化身百千。⁵⁵⁾南宋临安成为全国刻书业的中心,官刻、私刻、坊刻协同运作,形成完整产业链,王国维在《两浙古刊本考》序严称:“南渡以后,临安为行都,胄监在焉,板书之所萃集”,⁵⁶⁾有力佐证了临安在刻书业中的重要地位。这个刻书业集群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聚集,更是官方文化权威、私人资本与市场需求等多种社会力量交织、运作的空间化结果。刻印内容的选择和标准的制定,都映射着特定时期的社会权力结构与文化取向。在流通网络构建方面,临安作为江南运河、浙东运河及钱塘江的交汇处,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⁵⁷⁾依托临安发达的水陆交通体系,通过运河漕船与驿道商队,构建起辐射两浙、江右、湖广的跨区域传播链,使《错斩崔宁》等话本得以突破地域限制广泛流传,使临安的文化影响力通过空间网络播散至广阔地域,深刻影响着更广阔地域的文化认知与社会想象,推动了跨地域文化表征的形成。

III. 两宋都城话本的文学象征

现存于世的宋话本中,除却少数独立发行的单行本之外,主要散见于明代学者编撰的《清平山堂话》、《京本通俗小说》、《宝文堂书目》、《也是园书目》、《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书中。在对于宋代话本篇目的考证过程中,整理出具有较为明显两宋都城特征的话本共30部:

54) 孟元老等 著,周峰 点校,同上书,111页。

55) 于兆军,同上文,57页。

56) 谢维扬、房馨亮 主编,《王国维全集》(第七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3页。

57) 代宗宇,《南宋水运业的经营》,浙江大学 硕士论文,2008,Ⅱ页。

〈表 1〉两宋都城话本目录与空间坐标⁵⁸⁾

分类	序号	代表作品	关键空间坐标
汴京话本	1	唐公九谏	大内、宣政殿、朱雀门及皇城御道
	2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开封府、汴河舟渡与城门大相国寺
	3	志诚张主管	大相国寺前市、天汉楼、州桥
	4	合同文字记	开封府街、铺户街区、相国寺市井与寺前广场
	5	刎颈鸳鸯会	开封府、大相国寺市场、汴河州桥附近铺户区
	6	梅杏争春	文人家宅、御街、樊楼
	7	杨思温燕山遇故人	州桥东市、大相国寺、汴河岸北市、御街酒肆汴河码头
	8	张古老种瓜取文女	城外浚仪镇、艮岳附近田地、上东门
	9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樊楼、州桥、朱雀门御街
	10	郑节使立功神臂弓	宣武门外演武场、军器监、禁中殿廷
	11	赵伯昇茶肆遇仁宗	艮岳街茶坊、开封府衙、垂拱殿
	12	皂角林大王假形	东京、广州新会县、峰头驿、开封府、汴河
临安话本	13	碾玉观音	临安府、谭州、建康、钱塘门、井亭桥、西湖、清湖河
	14	菩萨蛮	临安府、吴七郡王府、中瓦子、西湖
	15	西山一窟鬼	临安府、王妈妈茶坊、西山、驼献岭、梅家桥下、钱塘门

58) 郑振铎在《明清二代的平话集》中所考证的宋话本有22篇、胡士莹在《话本小说概论》中所考证的宋话本有36篇、欧阳代发在《话本小说史》中所考证的宋话本有35篇、张兵在《宋辽金元小说史》(第二版)中考定的宋话本共有22篇、程毅中在《宋元话本》中考证39篇、章培恒在《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中考证8篇、余戈在《宋话本小说研究》中梳理14篇。在前人学者的考证成果基础上, 本研究中可以判断有30篇现存宋话本属于“汴京话本”与“临安话本”。“汴京话本”是指具有汴京的关键空间坐标的, 而“临安话本”是指具有临安的关键空间坐标的。本文主要对广泛认同的北宋的四篇作品:《赵伯昇茶肆遇仁宗》、《合同文字记》、《志诚张主管》、《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认定为南宋的六篇作品:《错斩崔宁》、《拗相公》、《蓝桥记》、《苏长公章台柳传》、《西山一窟鬼》、《西湖三塔记》, 共十篇作品, 进行逐一探讨。

分类	序号	代表作品	关键空间坐标
临安话本	16	拗相公	临安府、半山堂
	17	错斩崔宁	临安府、刘贵家、官府、西湖
	18	西湖三塔记	西湘、涌金门、四圣观、钱塘江
	19	风月瑞仙亭	临安、瑞仙亭
	20	蓝桥记	临安府、蓝桥驿、蓝田县
	21	五戒禅师私红莲记	临安府、涌金门、西湖
	22	杨温拦路虎传	临安府、虎林、杨温家、李贵山寨、杨员外家
	23	苏长公章台柳传	临安府、西湘旁书院、四望亭、西湖、西湖酒楼
	24	张生彩鸾灯传	杭州、镇江、新码头
	25	计押番金鳊产祸 ⁵⁹⁾	临安府、钱塘江、计安家酒坊
	26	乐小舍拼生觅偶	杭州钱塘江湖、罗刹林、武林
	27	范鳧儿双镜重圆	南宋皇城、临安、冯忠翊府邸、范汝为起义军据点
	28	喜乐和顺记	南宋临安府、钱塘江湖、八角井
	29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杭州、保叔塔、雷峰塔
30	宿香亭张浩遇莺莺	西洛、宿香亭、张浩园	

在表征空间⁶⁰⁾层面来看，汴京话本与临安话本通过不同的地域色彩与语言艺术，呈现出来被体验、被象征的汴京与临安城市空间结构及社会文化形态，而生成各自不同的表征空间。汴京话本植根于瓦舍“说话”传统，语言

59) 该作品时间跨越两宋叙事空间也由东京转移向杭州。故事前半部分发生在东京，靖康之变后，故事空间又转移到了杭州。东京的樊楼与金明池遥相呼应，成为俊男靓女游乐艳遇的情感发生空间，它们一起见证了北宋王朝的盛世。(夏明宇，〈双城映像：宋元话本小说的空间书写〉，《明清小说研究》第1期，2020，193页。)

60) 表征空间从语言学上讲就是一种象征修辞手法。这个空间生产的维度是指语言的赋义过程，从而与某种质性的象征物联系在一起。(亨利·列斐伏尔 著，刘怀玉等译，孟锴 校，同上书，17-18页。)

风格偏于粗犷与口语化, 强调现场演艺的节奏与张力; 而临安话本则在书面传播与文人参与的推动下, 语言日趋精致, 修辞更趋文雅。两地话本不同的语言风格, 不仅可以揭示其地域性差异, 更能从叙事艺术层面, 构成各自不同的表征空间。换句话说宋代描写都城的话本, 揭示了文化记忆构建的机制, 如汴京话本中对“樊楼”的空间怀旧与临安话本中对“西湖”的空间重构等, 皆构成了再生产的表征空间, 这种表征空间影响城市空间, 促使形成新的地域意识与审美取向。

1. 表征空间与地域意识

宋代话本往往融入大量真实地名和景物来营造场景氛围, 着力刻画都市的繁华与细节, 增强现实感和地域认同感。这个过程中作者体现了对都市空间的切身经验及其在叙事中的创造性投射。作品中出现的街市、桥梁、衙署等具体的空间描写, 不仅保留了物质背景, 也构筑了生动的都城物质空间图景, 更通过叙事活动将其转化为承载社会关系、文化意义和集体记忆的被象征化的“表征空间”。宋代话本中具有两个都城坐标的汴京话本与临安话本, 再现城市空间的过程中, 体现了物质结构与文化生态的城市经验、文化记忆等不同的地域意识。

1) 汴京梦华

《东京梦华录》中对汴京繁华的商业往来和华丽的市井生活的刻画, 让“梦华”成为了北宋都城的象征。同样, 汴京话本也通过北宋都城这一地域空间, 构建了都城经济繁荣与政治权威的“梦华”这一表征。

当时汴京户籍已达二十六万之众, 素称“八荒争凑, 万国咸通”, 为话本中所见的市井生活提供了真实语境与文化土壤。例如, 《赵伯昇茶肆遇仁宗》⁶¹⁾开篇即写道: “大宋仁宗皇帝朝间, 有一名秀才, 姓赵名旭, 字伯升,

61) 收录于《喻世明言》, 故事为蜀地书生赵伯升赴京应试, 茶肆题词偶遇宋仁宗。

乃西川成都府人氏。”⁶²⁾“西川成都府”为宋人熟悉的地名，流露出鲜明的北宋叙述语气。文中对汴京街坊、社会风俗的描绘，以及茶坊陈设与樊楼繁华景象的细致刻画突出了都城作为政治权利中心的机遇。赵旭初进汴京城，放眼一片锦绣与繁华，随即被仁宗召见，仅一字只差流落京城。不曾料想一年后，偶遇仁宗微服私访，盛赞其才华之下，任命为西川五十四州都制置。可以看出汴京作为北宋权利的龙虎风云汇聚空间，人才荟萃，机会如繁星降临在微观个体的命运轨迹之中，赵旭个人的起伏，也是普罗大众在汴京争取“发迹”改变人生的生动体现。这与《志诚张主管》⁶³⁾、《闹樊楼多情周胜仙》⁶⁴⁾等话本中的类似场面高度一致，这不仅体现了创作者对汴京物质环境的熟悉，更揭示了这些空间描写所承载的、超越物理层面的丰富文化内涵——它们是当时市民阶层共享的都市生活认知、社会关系网络与时代潮流的生动映照。从空间做为文化符号的角度解读，话本中精心构建的汴京图景，是被赋予了深刻社会意义与情感意义的空间载体。例如，街坊市井的文化图景：对日常街景与风俗的铺陈，构建了一个充满烟火气息的街道，它既是市民日常活动的舞台，也浓缩了他们对于都市生活复杂性。

但若要论及空间细节的精确度及其与史籍记载的高度契合，《志诚张主管》无疑是更为典型的例子。其开篇便以“东京汴州开封府”点明故事发生在京师，并多处渗透“界身巷”、“金银彩帛交易中心”、“绒线铺”等地名与行业细节⁶⁵⁾。话本中“开线铺的员外张士廉”与笔记记载的“界身巷”高度契合，这不仅进一步证实了文本对汴京商业景观的写实意图，同时，这种精确的空间定位本身也超越了地理标识，成为承载当时市民对财富中心认知与商业繁荣想

仁宗因试卷中“唯”字书写有误未录取他，后见茶肆题词赏识其才，终赐进士及第。

62) 冯梦龙 编，许政杨 校注，《喻世明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175页。

63) 收录于《警世通言》，故事为北宋开封线铺张员外娶王招宣府失宠小夫人，其勾引年轻主管张胜致张家涉讼，后张胜收留小夫人，揭示市井阶层伦理困境。

64) 收录于《醒世恒言》，故事为富商女周胜仙与樊楼范二郎茶坊互诉衷肠，父悔婚致其气绝，复活后寻范遭误杀，鬼魂三度相会终助范脱罪。

65) 《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京本通俗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90页。

象的特定符号空间。此外，话本描写的东京元宵灯市“门放灯”盛况，与《岁时广记》对汴京元宵“火树银花，金碧相射”⁶⁶⁾之景的描述相印证，又如《东京梦华录》所记宣和年间元宵节“灯山上彩”“作乐杂戏”之热闹场面⁶⁷⁾与话本中张主管元宵夜游灯市的描写相互印证。这些场景不仅再现了汴京的娱乐空间，更在文本中转化为具有特定社会意涵和叙事功能的表征空间：说书人在口头演说与书写时，不仅，将现实中的公共场所化为文本可感知的视觉符号，更通过张主管的视角，使元宵灯市这一物理空间在叙事中承载了机遇、邂逅与命运转折的象征意义，成为市民集体记忆中节日狂欢与潜在奇遇的典型意象空间。

又如《合同文字记》⁶⁸⁾文章开篇写道：“话说宋仁宗朝庆历年间，去这东京汴梁城离城三十里，有个村，唤做老儿村”⁶⁹⁾。此句中的“宋仁宗朝”和“东京汴梁城”明确指向北宋仁宗时期的都城汴京：“去这东京……离城三十里有个村”通过具体的地理距离描述，将村落与都城紧密关联，这种以“这东京”为空间基准点，向外延伸的叙述视角，不仅体现了叙述者身处北宋汴京社会的空间经验，更在文本层面构建了一种基于当朝都城中心地位的社会空间认知与归属感，是北宋时代汴京作为绝对核心空间在市民话语中的直接表征。“去这东京”的视角表达，表明说书人并非从后世回忆，而是以当朝汴京的核心空间立场在讲述。篇尾“话本说彻，权作散场”亦为宋代说书传统中的收场套语，其用语和始终围绕汴京的空间定位强化了其叙事空间表征的纯粹北宋特质。

除了上述叙述语言和套语体现的时代特征外，话本中具体的地理名称、建筑描写与城市空间布局的精确对应。《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的开篇便清晰地展现了这一点。《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开篇写道：“如今且说那大宋徽宗朝年，东京金明池边，有座酒楼，唤作樊楼”⁷⁰⁾，立刻为读者勾勒出金明池畔繁

66) 陈元靓 编，《岁时广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96页。

67) 孟元老等 著，周峰 点校，同上书，38页。

68) 收录于《清平山堂话本》，以北宋汴梁农户刘添祥、刘添瑞兄弟的家产纠纷为主线，围绕合同文书展开财产争夺叙事。

69) 洪楸，《清平山堂话本》，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25页。

华的都市图景。樊楼作为当时汴京著名的酒楼，其建筑形制在《东京梦华录》中有详细记载：“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⁷¹。这些描写不仅证明了樊楼作为市民娱乐中心的地位，也通过其宏丽的建筑形制与灯火通明的夜间景观，将物质空间转化为象征财富与欲望的符号场域——它既是商业繁荣的实体见证，也是市民对都市奢华生活集体想象的载体，为话本创作提供了兼具现实性和文化隐喻的双重参照。随后，作品描写周胜仙问路至“曹门”，这一情节同样来源于对都城地理的准确把握。曹门位于宫墙东侧，周围商肆云集，是汴京中心商业区的一部分——“位于城东马行街的东、西两侧巷道，皆为工作伎巧所居”⁷²。话本中“曹门里周大郎”以此为背景，塑造出富商形象，与史料描述高度一致。周家选址于此，不仅体现空间写实性，更折射出宋代市民阶层对城市空间的社会性编码，曹门作为商业核心区，其地理标识已成为财富与社会地位的符号，而“界身卷金银彩帛交易动即千万”的记载，进一步强化了该区域作为经济权力象征的集体认知。⁷³此外，作品写道：“婆子说：‘儿子朱真不在。’当时搜捉朱真不见，却在桑家瓦里看耍”⁷⁴，此处“桑家瓦子”地名同样与史料相符。瓦舍作为“三教九流”聚集之地，为盗贼销赃提供了便利，也反映出作者对城市边缘区域的深入观察。若非亲历汴京生活，作者难以将樊楼的辉煌、曹门的权贵气息与瓦舍的市井混沌描绘得如此精准。在汴京话本里刻画出了被体验的繁华汴京空间，这些空间细节的精确性，为话本中被象征为“梦化”的表征空间建构提供了可信的物理基础，蕴含了北宋这一地域意识。

2) 临安梦梁

南宋话本往往将视野投向临安城，将西湖、六和塔、五柳观、雷峰塔等

70) 冯梦龙 编，顾学颉 校注，《醒世恒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274页。

71) 孟元老等 著，周峰 点校，同上书，16页。

72) 李瑞 著，《唐宋都城空间形态研究》，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20，60页。

73) 孟元老等著，周峰 点校，同上书，14页。

74) 冯梦龙 编，顾学颉 校注，同上书，287页。

地方文化地标融入叙事,使其不局限于作为单纯的地理坐标,更多转化为承载集体记忆与地域认同的符号空间,以强化地域色彩和现实感受。

这一特点在以下话本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错斩崔宁》⁷⁵⁾中有“却说那高正中时建都临安,繁华富贵,不减那汴京故国”⁷⁶⁾,此句通过临安与汴京的并置对比,将临安空间符号化为南宋政权合法性与文化延续性的象征载体——“不减那汴京故国”的表述,既显露南宋人对新都的自豪,更在空间叙事层面完成对临安作为“新正统中心”的政治赋值,强化了作者与临安城的情感认同。临安作为南宋时期丝织业的重镇,话本中崔宁居住于褚家堂,并进城销售丝绸,其情节与时代经济环境高度契合,褚家堂这一具体居住空间的设定,不仅反映真实产业分布,更使崔宁的“丝织匠人”身份与以丝织业为中心的城市经济空间深度绑定,个体命运由此被编织进临安作为手工业符号空间的集体叙事中。

《蓝桥记》⁷⁷⁾中的地域坐标例如临安府、蓝桥驿、蓝田县等内容与《醉翁谈录》⁷⁸⁾辛集卷一所载《神仙嘉会类》、《裴航遇云英于蓝桥》⁷⁹⁾所载的坐标相似,其改变过程实则是将唐代仙凡遇合叙事植入南宋市井说书空间的文化转译行为。此外,《苏长公章台柳传》⁸⁰⁾中提及“大宋真宗朝有临安府太守”⁸⁰⁾,将杭州称为“临安”,此句“临安”称谓的刻意使用,本质是空间政治符号的主动建构,它将北宋真宗朝的时空背景与南宋都城名称并置,在叙事层面强行重置了历史空间坐标,使“临安”突破物理地名的限制,升格为南宋政权合法性的空间图腾,体现了宋人对于政权更替的认知。关于“花冠褶子”服

75) 收录于《醒世恒言》,故事为刘贵借得十五贯钱后被劫杀,其妾陈二姐因误信戏言出走,途中偶遇崔宁,二人因钱数巧合被官府错判斩首,揭露南宋司法黑暗。

76) 冯梦龙编,顾学颀校注,同上书,720页。

77) 收录于《清平山堂话本》,故事为裴航与云英的爱情传说,裴航于蓝桥得云英赠诗,历经考验终成眷属。

78) 罗烨,同上书,83-88页。

79) 收录于《清平山堂话本》,故事为苏轼与歌妓的轶事,描写苏轼题诗章台柳,后与歌妓情感纠葛的故事。

80) 洪楸著,同上书,200页。

饰的描写，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选像生有颜色者三四十人，戴冠子花朵，着艳色衫子；稍年高者，都着红背子、时髻”⁸¹⁾。由此可见，花冠褶子系宋代行首的典型装束，这一细节与《蓝桥记》、《苏长公章台柳传》的描述相符，进一步证明了两者皆为宋人创作。

在凸显宋话本地域特色方面，《西山一窟鬼》⁸²⁾对临安城市空间与市井生活的描摹尤为精到。《西山一窟鬼》以南宋临安府为地理坐标，文本多次出现“临安府”“中瓦子”“钱塘门”等地名，并辅以“说西湖山道”“杭州坊里”等描述，这些空间称谓不仅是地理标识，更构成了临安城市文化的符号系统，将听众引入真实的城市空间，展现了南宋说书人的叙事语气。作者对市民生活细节的把握亦十分精准：文中出现的“铺席”“一窟鬼”等民间俗语，与《都城纪胜》中“席铺”门类的记载以及《梦粱录》所载杭州茶肆“王妈妈茶坊名一窟鬼茶坊”⁸³⁾相互印证。这些市井空间的细节描写，堪称典型的临安话本，它实际上是对临安市民生活的方式的符号化再现，该话本不仅地理背景设置准确，还通过对各类城市空间的符号化处理，蕴含了丰富的地理意识。在临安话本里刻画出了被体验的文化景观与商业城市空间，即被象征为“梦粱”的表征空间。

2. 表征空间与语言象征

宋代话本叙事语言所呈现出的物理背景，作为空间生成的核心机制，参与建构特定的地域性与文化认同。这种叙事并非仅停留在景物描写层面，而是深度嵌入到话本语言的选择、叙述语气及表达策略之中，形成空间与语言之间的呼应关系。语言在此不仅是描写空间的工具，更是空间得以被体验和被理解的生成机制。审视这些地域性空间特征如何在语言层面得到呼应与深

81) 胡士莹 著，同上书，219页。

82) 收录于《京本通俗小说》，故事为吴秀才与鬼女相遇，揭露阴森诡谲的鬼魅世界，情节离奇。

83) 吴自牧，同上书，140页。

化,可以得知地理描写所体现的语言象征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叙述语言的选择、表达方式的差异及文本内部的文化语境密切相关。因此,对宋代话本都城空间的考察,应进一步转向语言层面的空间生产机制,探讨地域意识如何通过叙事语言的组织方式得以激活、并构成固化为具有象征意义的表征空间。

1) 汴京的语言象征

宋话本中有描摹北宋都城汴京的社会生活微观作品,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虽以爱情为主线,却生动地描述汴京的茶坊、酒楼等市井空间的语言叙事,进一步展现了被体验的北宋市民文化的多元面貌。故事中富商之女周胜仙与范二郎在樊楼一见钟情,其借糖水传情、拖媒说亲等行为,是在商业空间内对传统礼教空间边界的大胆突破,刻画了市井女子的机敏与果敢。话本通过鲜明的北方豪迈语感与直接表达的口语风格及词汇,构建出北宋都城空间中所体现的北方民族文化特征的表征空间。在作品中,“被大郎一个漏风掌打在一壁厢”、“被周大郎郎撵住”⁸⁴⁾中的“打”、“撵”等动词的使用,生动展现了北方豪饮的风俗。“奶子在傍边道:‘却也叵耐这厮!’”⁸⁵⁾,也能体现出北方的粗犷。周胜仙与茶坊伙夫的往来则为更加鲜明的例证,其作为封建传统礼数约束下的闺阁女子,竟敢大胆逐爱,并为与繁楼二公子产生联系,主动招呼伙夫,喊道:“卖水的,你倾些甜蜜蜜的糖水来”⁸⁶⁾、擅自在茶坊介绍自己“我是曹门里周大朗的女儿;我的小名叫作胜仙小娘子,年一十八岁,不曾吃人暗算。你今却来算我!我是不曾嫁的孩儿。”⁸⁷⁾可见宏观的社会价值与民俗风貌,往往会从普世中的民众身上得到最生动的彰显,尤其作为最受思想束缚与舆论压迫的未出阁女子,其言行举止也是汴京民风豪爽、直率,不喜拐弯抹角的直接印证。此外,如“一盞糖水在铜盂儿里”⁸⁸⁾中的器物铜孟、

84) 冯梦龙 编,顾学颀 校注,同上书,279页。

85) 同上。

86) 冯梦龙 编,顾学颀 校注,同上书,275页。

87) 同上。

热乎乎的糖水等偏北方的喻体，从取喻层面反映出其意象主要源自北方风物。

汴京话本作品《志诚张主管》的故事围绕汴京商铺的日常经营、婚姻买卖与市民伦理展开，折射出汴京作为商业中心的繁荣景象的同时，更在商铺空间内部上演着性别压迫与道德困境。旁人只因张员外对生活不满的抱怨，便鼓弄其道：“员外何不取房姨娘，生得一男半女，也绝不了香火。”⁸⁹⁾员外不加思索就立即差人唤张媒、李媒，对他们言“有三件事，说与你两人；第一件，要一个人材出众，好模好样的；第二件，要门当户对；第三件，我家有十万贯家财，需着个有十万贯房奁的亲家来对付我”⁹⁰⁾通过这些生动的语言表达可看出父系家族延续是首要目标，女性则被工具化为繁衍手段。上述语言艺术也证明由金钱主导的伦理观念与婚姻的“市场化”。媒婆欺上瞒下，张媒与李媒贬低张员外道：“若说这头亲事成，也有百十贯钱撰。只是员外说的话太不着人，有那三件事的他不去嫁个年少郎君，却肯随你这老头子？偏你这几根白胡须是砂糖拌的？”⁹¹⁾商议欺骗小夫人以达到谋利的目的，张媒道：“不愁小的的忒小，还嫌老的忒老。这头亲张员外怕不中意，只是雌二心下必然不美。如今对雌儿说，把涨价年级瞒过了一二十年，两边就差不多了”。⁹²⁾媒婆之间公开商量，用语受北方传统民俗影响，用词直白，不加修饰，谈吐之间市井气息浓烈。掩饰女方年龄瞒骗张员外，为获取财利欺骗小夫人，说明媒人行业已经从礼制中的“婚姻牵线人”堕落为牟利主体，真实性与伦理都被放到最后。媒人嘲讽张员外：“这几根白胡须是砂糖拌的？”等戏谑性表达，强烈讽刺员外的老态与自不量力，透露出媒人的真实想法，即并非尊重“社会上层”或“财主”，只是为了谋取利益，便可虚与委蛇。可见城市中介群体有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他们虽然认为老年男子要娶年轻女子是不合情理

88) 同上。

89) 冯梦龙 编，严敦易 校注，同上书，229页。

90) 同上。

91) 冯梦龙 编，严敦易 校注，同上书，230页。

92) 同上。

的,但却“明知不合理仍愿意促成”,皆因有利可图。小夫人因礼教压迫被转嫁的命运,映射了北宋商业空间对女性身体的商品化处置逻辑、市民阶层的道德困境与市井利益至上的现实原则。在小人物塑造上,小夫人形象虽然受到封建礼教的约束,但是随着北宋市民阶级意识的逐步崛起,也在心里勇敢的追求爱情,但小夫人的鬼魂复仇则被纳入了“善恶有报”的市民道德框架,将超自然力量转化为规训商业空间伦理秩序的符号工具。张胜的“忠诚”被塑造为美德,但其本质是风险规避的功利选择,这种矛盾反而揭示了北宋时期市民在商业空间中所采取的生存策略。也就是说,诚信既被表征为一种伦理价值,同时又是商铺这一商业空间内部进行风险计算的结果,从而清晰地呈现出在商业交往高度活跃的社会语境中所形成的北宋市民空间的语言表征。

2) 临安的语言象征

临安话本多以口语化开篇,其中俚语俗谚与生活器物相互交织,以“说话”套语、对白节奏与本地物象构成文本的声音层次。同时又吸纳江南柔丽的审美传统,使语言兼具通俗的日常质感与细腻的诗性风格,是江南山水滋养的柔性情调表征。《拗相公》⁹³⁾通过虚构情节刻画了王安石变法引发的社会矛盾,以及其“三不足”的刚愎形象,揭示其悲剧源于理想与现实冲突和性格缺陷。文中自问自答:“那位宰相是谁?在哪个朝代?这朝代不近不远,是北宋神宗皇帝年间,一个首相,姓王安石,临川人也。”⁹⁴⁾结论部分提出观点,宋朝的元气大伤,皆因熙宁变法的实施而遭到破坏,此乃靖康之难的直接原因,这一将国家衰亡归因于特定政治决策的论述,实则是南宋集体创伤在历史叙事空间中的投射。

除了借历史政治反思现实以外,临安话本的另一类重要题材是市井志怪故事。这类作品虽以鬼魅奇闻为外壳,却深刻嵌入本地生活细节,成为市民文化的镜像。例如《西山一窟鬼》故事内容与临安本地生活高度契合,且符

93) 这部作品收录于《警世通言》,以北宋政治家王安石为主角,讲述其因性格执拗推行变法失败后,退隐途中目睹民间疾苦与百姓怨声,最终在悔恨中病逝的故事。

94) 冯梦龙等著,严敦易校注,同上书,39页。

合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作为南宋的经典志怪作品，其内容深刻折射出宋室南渡后临安市民社会的文化特质。作品以宋元时期市井白话为基础，语言通俗浅近，贴近民间生活。以“说话”套语开篇“话说大宋仁宗年间，福州有个秀才姓吴名洪”，直接以说书人口吻展开叙事。对话中多用俚语俗谚，如“鬼话连篇”，不仅体现“说话”艺术的现场感，更将市井语言转化为塑造临安声音空间的符号。散文叙事中穿插骈文描摹鬼魅，如描写李乐娘容貌时用骈文“眉如翠羽，肌似羊脂”⁹⁵⁾，继承《都城纪胜》所述临安“小说”类“顷刻间提破”的悬念设置传统。⁹⁶⁾吴洪“三举不第”的困境，更折射出南宋临安科举解额稀缺史实，成为知识分子生存空间遭受挤压的社会现状的隐喻载体。⁹⁷⁾再者，作品中“油纸伞”、“青布帘”等临安特色器物的描写，与《梦粱录》所载“细色纸伞”“轻纱”形成互文，这些物质符号将志怪元素锚定于真实的市井空间，更与诗词中的“杏花”“流水”共同构建“虚实相生”的临安都市志怪空间图谱，使鬼怪叙事更具代入感，现实器物成为勾连阴阳的媒介，自然意象则转化为鬼魅栖居的诗意场域。

同为临安话本志怪类代表作，《西湖三塔记》⁹⁸⁾在语言通俗性上更为典型。其对人物形象的白描技法，本质是将身体转化为可悲市井大众凝视的“景观空间”，生动诠释了话本“面向大众”的本质特征。其中有对妇人形象的精彩白话文描写，“绿云堆发，白雪凝肤。眼横秋水之波，眉插春山之黛。桃萼淡妆红脸，樱珠轻点绛唇。步鞋衬小小金莲，玉指露纤纤春笋。”⁹⁹⁾本段落采用白话文，通过一系列空间化比喻，将身体部位转换为被观赏的审美符号，生动而形象地描绘了女性的美丽容貌与优雅气质。通过使用“绿云”来比喻头发，“白雪”来象征皮肤，将抽象的美转化为可触知的物质空间意象，使读者

95) 《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同上书，71页。

96) 孟元老等著，周峰点校，同上书，86页。

97) 王欣悦，〈南宋都城科士子与朝士的文学交友及其书写策略〉，《文学与文化》第四卷，2024，119页。

98) 收录于收录于《清平山堂话本》，故事为奚宣赞与蛇精白娘娘的传说，后被镇压于三塔下，为《白蛇传》雏形。

99) 洪楸著，同上书，21页。

能够清晰地构建出女性形象。同时,“眼横秋水”“眉插春山”等表达方式,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技巧,将女性眉眼比作秋水、春山,以自然景观置换身体部位,赋予了一种灵动的美感。在描述女性妆容和体态时,“桃萼淡妆”、“樱珠轻点”强调了妆容的淡雅与精致,“小小金莲”“纤纤春笋”则展现了女性体态的轻盈与手指的纤细柔美。这些白话文词汇既通俗易懂,又具有强烈的表现力,实则是将女性身体转化为符合审美审美的公共景观空间,能够使听众或读者迅速理解并产生共鸣。以及这句话“宣赞叫声:‘有鬼!’回身便走。婆婆道:‘宣赞那里去?’叫一声:‘下来!’”¹⁰⁰⁾该文段通过直接而生动的口语化质问,将楼梯这一垂直空间转换为权利压迫与害怕逃逸的戏剧场域,描绘了宣赞在惊恐状态下的行为与语言反应,展现了市井对话的质感。通过声音实现对逃亡者身体移动轨迹的空间控制,宣赞和婆婆两者之间的互动均与当时紧张且诡异的氛围相得益彰,同时也贴合了各自角色的身份特征。

白话艺术的优势还体现在于根植于江南的美学体系,临安话本融入了江南水乡的柔美与细腻,语言风格更加温婉流畅,富有诗意。其内容多涉及江南风情、才子佳人,展现了南宋时期临安城市生活的独特韵味及空间意象的符号化表达。在《梦粱录》卷十二中,西湖的景致被细腻的笔触所勾勒,如“堂宇霜闾,花木森森,顾盼湖山,蔚然堪画”¹⁰¹⁾这句。江南地区丰富的水系孕育了众多精巧的园林建筑,其中“堂宇”彰显了江南建筑的古典雅致。竹山阁之景,花木葱茏,山水相辅相成,湖光山色相互映衬,共同构筑了一幅江南园林与自然山水和谐共生的诗意画卷。这种堂宇、花木与湖山的空间组合,实为江南诗意空间的经典符号。此外,西湖之会耸翠楼“千峰连环,一碧万顷,柳汀花屋,历历栏槛间”¹⁰²⁾的景致亦能体现江南特有的温婉与秀丽,是西湖景的典型描绘。“柳汀花屋”则将水岸生活提炼为充满烟火气的诗意空间符号,使水乡的旖旎风光上升为承载地域文化认同的视觉图腾。临安话本正是通过上述生动地描写,在语言中构筑了临安这一具有江南柔美气质的表

100) 洪楸 著, 同上书, 23页.

101) 吴自牧, 同上书, 105页.

102) 同上.

征空间。

IV. 结语

本文通过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三重辩证法则”，对两宋都城话本中所描绘的汴京与临安两地的空间进行了多维分析。从空间生产理论的视角看，汴京话本与临安话本对地域的描写呈现出了“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之间的三角形动态转化辩证关系，并构成了一种可在文本中追踪的闭合机制，三重空间辩证关系最终在话本文本中达成有机统一。

两宋话本在“表征空间”层面呈现出结构性的差异，例如汴京话本依托汴京独特的都市，以密集的地名指涉、直陈的社会语言与北方市井气质共同塑造出鲜明的北地空间意象；临安话本则借助江南自然符号、柔婉细丽的白话叙事与市井生活器物，构建出兼具诗性与地方性色彩的江南文化空间。这种空间符号体系的差异，使得两宋话本在叙事风格、语言形态与美学取向上呈现出稳定的地域分化，从而形成各自独具特色的表征空间，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空间表征。

地域意识与语言象征经由话本叙述，逐渐内化为社会认知结构，影响官方制度设计与文化传播机制。例如，临安市民对精致生活的审美偏好反过来推动更成熟的印刷市场与文化消费机制的形成，使文化政策与商业制度更倾向于满足精细化、市场化的文学需求。这些制度性变动促进市井文化空间的扩展，为话本创造新的叙事主题、市场需求与受众结构，形成“生活—制度—文本”三者之间的协同效应。这种“空间生产—文本生产”的共生机制，正是两个都城城市文化与话本艺术协同发展的内在动力。这类空间表征又进一步作用于空间实践，形成循环结构。

城市的空间实践—如汴京与临安的城市布局直接决定了说话活动的地理分布、社会交往模式与市井生活频率，从而构成话本文本生成的基础性语

境。真实生活经验具有地域性的表达风格和叙事资源，这些生活经验的沉淀通过说话艺人的语言叙事转化为被体验的、被象征的表征空间。

两宋都城话本在题材选择以及语言风格上根植于各自独特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之中。汴京话本倾向于采用更为直白且犀利的叙述方式，多聚焦于中原历史题材，反映市井百态的鲜活场景；而临安话本则在继承北方文学传统的基础上，融入了江南地域文化的细腻描写，展现出更为系统化和商业化的文本形态。语言使用和词汇特点不仅折射出不同都城居民的日常生活习惯，也深刻体现了其思维模式与审美取向的差异。艺术风格的分野进一步呼应了两宋时期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的转移过程，展现出文学创作与时代变迁之间的紧密联系。

总的来说汴京与临安的话本文本既是城市空间结构与社会实践的产物，又在叙事中重新定义城市空间的象征意义与文化秩序，形成空间生产与文本生产之间的双向建构关系。两宋城市社会的独特结构与文化氛围不仅激发了多元的创作可能，也使通俗文学成为观察城市经济、社会网络与文化认同的重要窗口。本研究通过揭示空间三重辩证关系在话本生产中的具体现实，为理解宋代城市文化的运行机制及其对文学发展的深层影响提供了新的理论路径，并为探讨当代城市化情境下的文化生产与空间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参考文献>

- 陈元靓 著，《岁时广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
- 程民生 著，《宋代地域经济》，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
- 程毅中 著，《宋元话本》，北京：中华书局，2004。
- 代宗宇，《北南宋水运业的经营》，浙江大学 硕士论文，2008。
- 邓广铭 著，《宋史职官志考正 宋史刑法志考正》，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 冯梦龙 编, 顾学颉 校注, 《醒世恒言》,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
- 冯梦龙 编, 许政杨 校注, 《喻世明言》,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 冯梦龙 编, 严易敦 校注, 《警世通言》,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 《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 《古本小说集成京本通俗小说》,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 亨利·列斐伏尔 著, 刘怀玉等 译, 孟锴 校, 《空间的生产》,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 洪楸 著, 《清平山堂话本》,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3.
- 胡士莹 著, 《话本小说概论》,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姜兆杰, 〈南宋临安城市水系与人居耦合关系研究〉, 华侨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2023.
- 李春堂, 《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
- 李瑞 著, 《唐宋都城空间形态研究》,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20.
- 梁淑芬, 《北宋东京勾栏瓦子研究》, 河南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2009.
- 罗烨, 《醉翁谈录》, 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 孟元老等 著, 周峰 点校, 《东京梦华录》(外四种),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8.
- 欧阳代发, 《话本小说史》, 武汉: 武汉出版社, 1994.
- 任崇岳, 〈北宋末年的两次中原大移民〉, 《商丘学院学报》第二十四卷, 2008.
- 斯波义信 著, 方健等 译, 《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 孙婧, 〈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研究〉, 吉林大学 博士论文, 2023.
- 吴自牧, 《梦梁录》,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0.
- 谢维扬、房馨亮 主编, 《王国维全集》,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0.

- 王昕 著,《话本小说的历史与叙事》,北京:中华书局,2002.
- 王欣悦,〈南宋都城科士子与朝士的文学交友及其书写策略〉,《文学与文化》第四卷,2024.
- 夏明宇,〈双城映像:宋元话本小说的空间书写〉,《明清小说研究》第1期,2020.
-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 余戈,〈宋话本小说研究〉,重庆工商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2011.
- 于兆军,〈雕版印刷与宋人的图书编刊〉,《出版广角》第十卷,2022.
- 张兵,〈北宋的“说话”和话本〉,《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1998.
- _____,《宋辽金元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 张岱 著,夏咸淳、程维荣 校,《陶庵梦忆 西湖梦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张建,〈《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市井——北宋东京研究〉,《河南社会科学》第十七卷,2009.
- 张义祥,〈北宋大运河功能及社会影响研究〉,郑州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2021.
- 郑振铎,《郑振铎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 周芊,〈东京梦华录之北宋都城汴京民俗生活研究〉,青海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2012.

<Abstract>

Using Lefebvre's Spatial triad,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Song-dynasty Huaben construct the urban spaces of Bianjing and Lin'an. The development of Huaben reflects a dynamic cycle among space practice, representation space, space representation, forming a self-reinforcing

mechanism within the texts. Urban practices—night markets, entertainment quarters, expanding commercial districts—shaped the locations of storytelling,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everyday rhythms. These lived experiences were transformed into regional narrative styles and symbolic imagery, which then formed shared cultural meanings. Such representational spaces influenced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 as repeated narrative symbols shaped collective perceptions of the city and even affected governance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Lin'an's preference for refined living, for example, stimulated printing markets and literary consump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s in turn reshaped spatial practice, expanding urban cultural spaces and generating new themes and audiences for Huaben. This reciprocal “space-text” production highlights how the distinctive urban environments of Bianjing and Lin'an not only nurtured literary creativity but also developed in tandem with popular storytelling.

Key Words : 宋话本(Song Huaben), 两宋都城(Two capitals of the Song Dynasty), 空间实践(Space practice), 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space), 表征空间(Space representation), 文学象征(Literary symbol)